

大学生“村官”社交心态探析

◎ 武艳华 刘计峰

摘要:在对福建泉州大学生“村官”基层社会关系调研的基础上,文章首先分析了大学生“村官”基层社会关系呈现的社交格局差序化、社交联结功能化、社交互动结构化和社交测量复杂化等特质,随后指出其在基层社会交往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大学生“村官”软实力打造和政府层面的制度保障两个角度进行思考。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 基层社会关系 村干部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为进一步加快海西新农村建设的步伐,福建省将大学生“村官”政策列为海西建设的重要项目之一,在2008年首批招收479名大学生“村官”的基础上,又于2009年选聘576名大学生“村官”^①。2009年7月,为了解福建省大学生“村官”基层生活和工作情况,厦门大学受福建省委组织部委托,组建了“大学生‘村官’工作状态调查”课题组,共派出9支小分队分别对福建省9个地、市的第一届大学生“村官”进行调研。根据人口比例、经济发展水平和大学生“村官”分布,本调研组在泉州地区选取了安溪县金谷镇金谷村、安溪县龙门镇溪瑶村、晋江市英林镇英林村、晋江市安海镇前蔡村等四个村庄作为调查点。本文所用资料和数据均来自“大学生‘村官’工作状态调查”泉州地区调查组搜集的资料。主要运用集体座谈和一对一深度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法,重点走访了这些地区的5位大学生“村官”、20位村干部、40位村民和4位村务工作者。调研组还从政府部门收集了有关调研地经济发展和农村工作事务的政策文件,帮助了解调研地的基本人际关系情况。

一、大学生“村官”基层社会关系释义

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基层社会人际交往的和谐是立足的基石。理解社会关系是明晰大学生“村官”基层社会关系内容的基础,因此,对社会关系的含义进行界定显得十分必要。社会关系是人类开展生产和生活活动的纽带,其功能的充分发挥需要一定规模的社会互动。有学者认为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体之间稳定的和必要的具体历史联系,具体表现为实现人类活动的方法和手段。^②青井和夫则认为,社会关系是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互动的模式相结合,形成一个功能性单位^③。笔者以为社会关系的界定应该突出关系本身的特性,所以社会关系应该是由两个或更多个体通过合作、竞争、冲突、强制和顺从等互动模式,在社会实践中桥联成的关系结合体。结合这些特质,大学生“村官”基层社会关系是指其在村级范围内开展工作必须处理的社会关系。根据互动对象的不同,“村官”基层社会关系涉及的客体为村干部、村务

工作者和村民,与三者的关系构成大学生“村官”基层社会关系的主体部分。大学生“村官”与村干部的关系,指其与村两委成员之间发生的互动关系,具体涉及村长、村支书、村委员、妇联主任、村会计等成员。大学生“村官”与村务工作者的关系。村务工作者是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经过国家正规的选拔程序产生,实行合同制的管理模式,在农村专门从事村务建设、管理和服务工作的人员。因其与村官工作内容比较相似,两者在党建事务、村委选举、计生工作、文化宣传、卫生知识普及等工作领域关系比较密切。大学生“村官”与村民的关系。村民是大学生“村官”直接和最终的服务对象,因处理村级事务而与村民发生的关系都属于两者关系范畴。两者互动集中于计生、农业技术咨询和政策宣讲等领域。

二、大学生“村官”基层社会关系的特征

(一)社交格局的差序化

社交格局的差序化是指以大学生“村官”为中心,辐射村务工作者、村干部和村民的互动格局中,在主动交往意愿(较强、一般和较弱)、交往形态(合作型、竞争型、冲突型、强制型和顺从型)和交往效果(明显或不明显)上显现的差序化分布。从交往意愿看,按照村务工作者、村干部和村民三者顺序依次减弱。与村务工作者工作内容相似和年龄的相仿,使得大学生“村官”表现出较强的交往意愿,交往的次数明显多于村干部和村民。“村官”谈到刚到农村时一切都很陌生,相比跟村干部和村民的接触,他们更愿意和村务工作者进行交流,同龄人之间的共同语言要多一些。与村干部的交往意愿介于村务工作者与村民之间,且大多局限在工作开展上的任务传达、项目策划和政策宣讲等方面。“村官”愿意跟驻村干部和其他村干部进行交流,以增进对农村政策的了解。在与村民的交往中,“村官”表示因工作任务的要求会积极参与,比如开展计生工作、政策宣讲、推广新技术等。但“村官”平时参与村民集体活动比较少,积极性也不高,表现为访谈中超过半数的村民反映很少在集体活动场合见到“村官”。访谈中村民说:“有时候会看到他(村官)过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但也不是很经常,大部分时间他(村官)可能都呆在村委会。”从交往形态看,“村官”与村务工作者交往形式多样,既包括工作上的合作与竞争兼存的关系,也包括私下的朋友式交往。这种合作与竞争的关系表现为,村务工作者在与“村官”合作的同时自身也存在压力。访谈中一位村务工作者谈到,和“村官”一起整理党务材料时,就会尽量做的好一点。私下的朋友式交往一般发生在下班之后、周末或假期的时候,村务和“村官”会一起休闲娱乐。“村官”与村干部的交往大多局限于正式工作关系,非正式场合的私下交流较少,呈现合作与顺从兼存的交往特征。由于年龄差异和适应工作的需要,“村官”在工作中会表现的比较谦虚,跟村干部学习农村工作的经验。大部分村民认为与“村官”的关系良好,只有极少数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融洽。与村民的交往呈现以工作内容为主要话题、合作型关系为主的交往形态,而聊天则是与村民交往的最主要形式。知晓“村官”的村民表示,由于对大学生“村官”抱有很高期望,所以会积极配合他们工作。总之,合作、竞争和顺从是与三者交往中呈现的三种特质,但因对象不同而存在差异。从交往效果看,按照村务工作者、村干部和村民的顺序依次减弱。所有被访的村务工作者对大学生“村官”的毕业院校、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和日常生活情况都比较了解,而“村官”对村务的情况也很了解。一位“村官”说:“我跟村务吃住都在一起,很熟的。我们村一共有三个村务,一个是江西师范学院的,一个是华侨大学的,还有一个广播电视大学的。”相比村务和村官的相互了解,村干部则大多只知道村官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对其毕业院校和兴趣爱好了解较少。而“村官”与村民交往效果最不明显,调查中有40%的村民不知道自己村里有大学生“村官”,而知情的村民中约2/3的人称很少见到他们。整体来说,大学生“村官”与三者的社交格局在交

往意愿、交往形态和交往效果等方面呈明显的差序化分布。

(二) 社交互动的结构化

分析吉登斯社会互动的结构化图示,可以看出社会互动的结构化是由分析语义规则的意义而进行沟通、社会互动是以中介组织为保证的权力支配机制、道德意涵的强制性规则通过互动而合法化等三部分组成。^④大学生“村官”社交互动也符合吉登斯社交互动结构化特质。

1. 沟通中的互动规则在三者的社交互动上有明显体现

村干部与“村官”是上下级关系,他们之间互动的规则是执行工作中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具体表现为遵守职位等级高低的规则进行沟通,在日常工作中要向领导请示事务的处理办法、与领导商榷新项目的策划、不能越俎代庖等。访谈中一位“村官”谈到“我们头上有‘三座大山’就是三个领导,具体的事情都得跟领导请示,按章办事领导还是很支持我们工作的。”“村官”与村务工作者属于同级之间的互动,合作和竞争是互动中暗含的规则,工作中则是共同商讨计划和任务完成的办法。其中一位村务说:“由于我们之间工作内容有交叉,在计划生育、档案整理、招商引资和政策宣讲等领域,我都得跟‘村官’一起合作完成”。大学生“村官”是村民的“上级”,与村干部对“村官”的上下级领导方式不同,在与村民的互动中更多的是扮演发布信息和执行任务的服务型角色。总之,社交互动中各主体按照相互之间的规则进行沟通的特征始终存在。

2. 村官基层社会关系的建立受权力支配

按照权力高低等级排序,大学生“村官”基层社会关系格局中村干部最高,村民最低,中间为大学生“村官”和村务工作者。这种权力关系格局呈现两个特征:一方面,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关系比较紧张,对利益和权力等稀缺资源的争夺是其主要原因所在,集中表现为村民对村委会选举公平性、国家征地补偿金额、村级贫困户界定和补助发放等问题存有质疑。另一方面,大学生“村官”和村务工作者在村干部和村民两者间起缓冲带作用。大学生“村官”名为村官,却有名无实,和村务工作者一样仅仅是村长或支书的助理,一般不会介入利益纷争,再加上为当地的发展带来文化知识和科技信息,因此与村民的关系相对融洽,对缓解干群矛盾有很大的作用。访谈中村民说到:“对‘村官’我们一般都很支持,毕竟他们是大学生,比较清廉和公平,所以要是‘村官’来办事我们会比较配合,换作村干部这得另说了。”或是“‘村官’跟村民没什么利益瓜葛,脾气比较好,比较大公无私,还对村务活动有监督作用,所以我们都会支持,态度会比较好。”

3. 道德规范加速社交互动的合法化进程

访谈中,“村官”一致认为服务新农村建设是其任职的首要目的,这种道德责任感使大学生“村官”与村务、村干部和村民的关系纳入到新农村建设的工作范畴内。“村官”秉承发挥才智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道德责任感,与村民、村干部和村务工作者进行积极的社会互动,在互动过程中与村民和村务建立的私人关系也因服务于新农村建设而合法化。“村官”说:“下基层就是为了锻炼自己,为农村发展作贡献,在责任感的驱使下,会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关系,争取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 社交联结的功能化

联结是社会关系网络最基本的分析单位,格兰维诺特将其分成强联结和弱联结两种。强联结是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弱联结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互动的频率、感情力量、亲密程

度和互惠交换是判断强弱关系的四个维度,正向的为强关系,反之为弱关系。^⑤按此测量维度,大学生“村官”与三者的关系为强弱联结相间,与村干部、村务工作者为强联结,与村民为弱联结,联结的功能化作用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突出体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工作领域。大学生“村官”社交联结的经济功能表现在与村务工作者、村干部因工作共同实施村庄发展计划、策划招商引资项目和带领村民致富而产生的关系。访谈中,有60%的村民认为大学生“村官”在带领村民创业致富中作用显著。大部分村干部认为“村官”对农村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五位“村官”均认为,自身的加入给所在村庄带来实际的利益,有助于新农村建设的开展。政治功能在社交关系上表现为强关系优化了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村官”带来先进的文化知识和思想理念,在关系联结纽带共同工作任务的帮助下,对优化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有积极影响。有村干部说“大学生‘村官’整体素质、文化思想比普通村干部高,而且又有热情和活力,这对提升基层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有一定积极作用”。“村官”与村民的关系总体上是强弱联结相间,但弱联结居多。分析访谈资料可知,由于大学生“村官”本身社会关系处理能力要弱于村干部,加上服务期限只有两年的限制,导致大学生“村官”主动构建亲密关系的努力收效甚微。文化功能上,60%的村民认为大学生“村官”带来了先进科技文化知识和先进的管理理念。大部分村干部认为,“村官”的到来提供了比较新鲜的建议和意见。“村官”自评一致认为,自身在传播新鲜文化理念和思想上作用比较大。由此使其与村务工作者、村干部和村民的社会关系变得相对融洽。村民认为支教活动使“村官”与他们的关系变得融洽,这印证了文化功能对融洽社会关系的作用。

(四) 社交测量的复杂化

社会关系是社会互动的一种类型,一般从向度、广度、深度和频度等四个维度对社会关系进行测量。向度反映社会互动的方向,表明互动双方的关系性质,包括情感关系、地位关系和利益关系。广度反映社会互动的范围,表明互动双方交往领域的大小。深度反映社会互动的程度,表明互动双方相互依赖的大小,包括双方依赖的程度、利益关联大小、情感投入大小、互动延续时间的长短、互动规范的复杂程度。频度反映一定时间内发生社会互动的多寡。^⑥纵观大学生“村官”基层社会关系的四个维度,向度指标下与三者的情感关系都是亲和而融洽的,但地位关系上存在矛盾。地位关系上矛盾突出体现在“村官”与村干部同为基层干部,地位是平等的,但在权力分配格局上“村官”明显被边缘化,处于地位与权力不对等的状态。访谈发现,“村官”多从事助理和档案整理工作,而在村委会选举和村财政等权利和利益集中体现的事务上处于边缘地位,这对其优化基层民主建设作用的发挥多有不利。广度指标下测量复杂化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大学生“村官”自身角色的模糊不清,其所扮演的角色既是村长或支书助理,又是党建、计生、政策宣讲部门的工作人员,又随时可能被镇里“借调”。调查中村干部说“xxx既是大学生‘村官’,又是村长助理,又是书记助理,过年后又会是镇里的下派干部,我们的多面能手。”由此其互动领域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增加了广度测量的难度。深度测量在情感投入多少、互动延续时间长短等问题上变得复杂。上文提到工作和年龄的原因其与村务工作者的情感投入应该是最多的,但对村干部和村民情感投入的多少则难以考量。对于互动延续时间因服务期限的限制,为其发生和测量带来了难度。潜在发生的社会关系因时间的原因而被限制,导致大学生“村官”现有的基层社会关系不能反映其社会关系的真实面貌,会造成社会关系测量的不准确。正如访谈中一位村民所说:“听说‘村官’在我们这呆两年,时间是比较短的。要是能力比较强的,第一年稍微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第二年才开始熟悉这里的人际关系。可是,基本上熟悉环境了,人也要走了。你说,这关系怎么发展?”在社会关系

发生的频度上,“村官”与村务工作者的互动频率最高,交往最深,与村干部互动的频率次之,而与纯工作关系的村民互动频率最少。但由于没有互动频率(高、一般、低)的统一测量标准,导致互动频率结果的划分比较困难。因此,地位与权力的不对等、多角色带来的测量领域的复杂、互动延续时间测量的不可操作、互动多寡缺乏统一标准共同导致大学生“村官”基层社会关系测量的复杂化。

三、问题及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大学生“村官”在基层社会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与村民互动效果较差以及在基层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村官”在农村基层作用的发挥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应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有鉴于此,应从大学生“村官”自身软实力和政府层面的制度保障入手,内外结合,共同促进其基层社会关系存在问题的解决。

(一)大学生“村官”软实力打造

为建立顺畅的社会关系,大学生“村官”要放低姿态,主动融入村民群体,积极与之建立良好关系。此外,还要努力提高参与社会关系的软实力,从而为取得良好的社会互动效果打下基础。为提高参与基层社会关系的能力,防止权力被边缘化,大学生“村官”要有参与基层民主权力的意识,充分发挥参与基层民主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比如在基层党建交流会积极发言,在村委会选举中秉持正义监督选举的公平性等,充分发挥在基层组织权力建设中的作用。此外,“村官”要端正心态,积极投身于新农村建设,积极发挥经济建设功能。“村官”的服务期限仅为2年,部分人存在着混够日子就走人的思想,因此工作不积极,态度不认真。因此,大学生“村官”应该调整心态,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以增加自身在村务决策上的发言权。

(二)制度层面提供保障

服务期满后考核标准的不完善以及社交能力培训体制的缺失等问题是目前大学生“村官”政策中的不足,影响了村官积极作用的充分发挥。针对考核标准不完善出现的问题,政府部门应该实施考核与期满后去向挂钩的制度,考核结果的好坏直接决定服务期满后工作单位的性质和工资待遇等,从而激励大学生“村官”发挥聪明才智,更好地服务农村。同时为解决大学生“村官”社交能力差的问题,政府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首先,组织具有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人员重点讲解农村基层社会关系状况和处理的技巧,使他们及时熟悉各种社会关系处理的情境与方法。组织村干部带领大学生“村官”走入村民,通过亲身实践的方式对其进行基层社会关系的实践教育,提升其社会关系的处理能力。其次,政府可以利用报纸、电视和村务宣传栏等信息传播媒介加大对“村官”政策的宣传力度,争取村民对“村官”的理解和支持。最后,政府可以调整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高校从源头上重视人才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为“村官”具备良好的社会实践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注:

- ①郑帅.福建 576 名大学生“村官”出征[N].人民日报,2009-8-4.
- ②C.Л.采帕耶夫,段和珊.社会规范与社会关系[J].国外社会科学,1988(7).
- ③青井和夫.社会学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64.
- ④转引自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26-227.
- ⑤转引自李正彪.国外社会关系网络理论研究及其在国内企业研究中的运用[J].经济问题探索,2004(11):59.
- ⑥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35.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

责任编辑 纪峰